

商业和平论：一个理论批评^{*}

韩真 张春满

【内容提要】 经济联系和经济依存是否会带来和平？古典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这些理论没有用规范的科学研究方法来证实这一结论。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当代西方商业和平论用定量的研究方法确认了经济依存与和平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但这些模型在建立过程中往往没有像古典自由主义理论那样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忽视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依存可能会对一国的社会和政治发展产生的消极影响，从而导致其估算存在偏差。作者使用新的模型和数据对加茨基模型进行了改进，并使用了混合研究方法（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来说明定量模型中缺失的因果机制。新的模型说明，当两国间资本流动量越大，发生国际冲突的可能性也越高。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学术批评完全建立在加茨基模型的基础之上，通过对其内在模型的解构而建构出了新的理论模型并得到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中国学者可以采用这种学术批评方式参与中西方的理论争论，从而推动理论创新和发展。

【关键词】 商业和平论；新自由主义；混合研究；定量模型

【作者简介】 韩真，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加拿大蒙特利尔 邮编：H2X2E2）；张春满，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美国巴尔的摩 邮编：21210）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16)02-0130-26

^{*}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承担。如需相关数据和材料，请与张春满联系：czhang54@jhu.edu。

一 导论

经济联系或者经济依存是否会带来和平?如果是,为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德之间高度的贸易相互依存性没能阻止两国间战争的爆发?如果不是,那么在什么情况下贸易不会带来和平?如果如同现实主义者所宣称的商业利益总是无法战胜现实利益,例如国家生存和权力最大化的诱惑,那么讨论商业和平有何意义?现代高度一体化的全球经济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国家和国际关系结构?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长久的理论探索,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尽管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但是通过对这些理论进行细致的考察,本文发现它们也存在一些理论缺陷,甚至具有一定的误导性。推动国际关系的理论创新需要我们不断大胆审慎地对既有理论的核心假设、研究方法和理论命题进行细致的剖析。本文试图以商业和平论为例,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方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批评。需要指出的是,一些中外学者已经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开展了学术批评。但是学术批评的方式是多元的。在中国,主流的批评方式是先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行简述,然后在此基础上介绍西方学者(来自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和其他流派)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批评。而本文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是从该理论自身出发,以探究其内在的矛盾为出发点,进而提出其内在的问题。换句话说,一些学者是在“进口”西方学术界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批评,这些批评在被中国学者介绍之前业已存在;而本文是通过考察自由主义的理论模型,直接“生产”学术批评,是一项新的研究工作。本文的目的不是为证明两种方式孰优孰劣,只是希望进一步引起中国学者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反思和创新。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简要介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要素和商业和平论的发展历程;第三部分重点分析新自由主义兴起之后对商业和平论的理论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埃里克·加茨基(Erik Gartzke)的资本主义和平模型作为当代商业和平论的代表性成果会被重点引入;第四和第五部分是本文的重点,即对以加茨基模型为代表的当代商业和平论分别用定量和定性的方法进行理论解构和重构;最后是结论。

二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商业和平论

自由主义理论是与现实主义、建构主义三足鼎立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三大主要流

派之一(见表1)。^①而商业和平理论则是当代西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支柱之一。^②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采用“自上而下”的推导逻辑、强调国际体系架构(systemic structure)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不同,自由主义理论则采用“自下而上”的推导逻辑,强调国内要素,如国内的理性个体及社会团体的偏好(domestic societal preference),注重国内政治制度对国家对外政策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国际关系。自由主义理论学者安德鲁·莫拉维切克(Andrew Moravcsik)运用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科学研究纲领(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将这一自下而上的逻辑定义为自由主义的理论核心,^③并在此理论核心基础之上发展出了三大假说。其中强调国际贸易带来的商业利益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即为商业和平理论,其核心假说是因为贸易比战争成本更低、收益更大,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会采取和平的对外政策以确保从贸易中获得的利益最大化。

表1 西方国际关系三大主流理论的基本特征

	现实主义	自由主义	建构主义
基本分析对象	国家(state)	个人(individual)	非物质的思想,规范,观念、文化等
理性假设	理性	理性	不强调理性假设
因果关系(causality)	探寻因果关系	探寻因果关系	强调建构环境作用(constitutive effect),不一定探求因果关系
自变量	权力结构	个人理性选择(preference)及国内政治制度	观念或规范性变量(ideational)
国际体系结构	无政府状态(anarchy)	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	强调个体与结构之间的建构过程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① 在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革命兴起之前,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长期分庭抗礼。甚至可以说没有威尔逊主义十四点和平纲领,就不会有摩根索对此的批判以及后来华尔兹对现实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② 参见 Bruce Russett and John Oneal, *Triangulating Peac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ew York City: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另外两大自由主义理论是民主和平理论和国际组织/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有西方学者倾向于将制度主义单独列为一个理论流派,而在自由主义理论中用普遍价值取代国际组织和制度的作用,但学界对此尚存在争议,特别是在如何使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普遍价值的问题上似乎有很大困难。

③ Andrew Moravcsik, "Taking Preferences Seriously: Lib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1, No.4, 1997, pp.513-553.

自由主义学者经常将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著于1795年的《永久和平论》作为贸易和平的开山之作。^①在此文中,康德提出了“世界性权利(cosmopolitan right)”这一概念,即个人有权利与外国或他地居民发生贸易,而贸易双方基于自身利益考虑有权利接受或者拒绝贸易的发生。当这样基于双方自由意愿的贸易得到保障,国家和个人就没有使用暴力来攫取自己想要的利益的动机和理由。^②亚当·斯密(Adam Smith)同样强调非暴力胁迫的自由交易对和平和政治正义的促进作用。^③但是早期的商业贸易理论著作大部分停留在描述分析的层面,欠缺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中严谨的模型建构和精细的因果关系分析。比如康德的永久和平理论只是认为当世界性权利得到保障,持久和平就“应当”能实现,但对于贸易带来和平的因果机制却语焉不详。^④

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爵士在1912年出版的《大幻觉》一书中第一次尝试科学化商业和平理论,并为其提出了第一个重要的因果机制:贸易带来机会成本的变化。^⑤安吉尔爵士认为,通过战争占领和统治他国土地的方法来攫取财富是当时欧洲统治者们脑中的一个幻觉。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后,土地在经济生产中的重要性逐步下降了,而有熟练技能的个人在生产中的重要性上升了。通过战争攫取土地往往会带来人力资源的大破坏,而且战胜国也需要花费很多资源来迫使被占领土地上的人民屈服并有效地恢复生产,因此国际贸易成为比战争更有效的积累财富的手段。^⑥一言以蔽之,如果国家能理性地计算机会成本的话,它们会发现贸易与战争比起来成本更低、收益更高,因此国际贸易的盛行会让战争手段变得过时。

① 参见 Michael Doyle,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0, No.4, 1986, pp.1151-1169.

② 参见 Immanuel Kant, *Perpetual Peace: A Philosophical Essay*, London: Swan Sonnenschein & Co. Ltd., 1795.

③ 塞缪尔·弗莱萨克研究了康德和亚当·斯密早期关于《国富论》的互动,认为康德和亚当·斯密一样相信自由市场对国际间正义和繁荣的推动作用。参见 Samuel Fleischacker, “Values Behind the Market: Kant’s Response to the ‘Wealth of Nations’,”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17, No.3, 1996, pp.379-407.

④ 因果机制应当能从微观细节上解释自变量 x 的变化是如何造成因变量 y 的变化的。对因果机制的强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定量分析中常见的关联而非因果问题,因此在近年来的方法论研究中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关于因果机制的定义和相关讨论,可参见 Henry E. Brady, “What Is Causality,” in Janet M. Box-Steffensmeier, Henry E. Brady and David Collier, eds.,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Method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217-270.

⑤ 参见 Norman Angell, *Europe’s Optical Illusion*, London: Simpkin, Marshall, Hamilton, Kent & Co., 1913, pp.13-23.

⑥ 一战的爆发证明安吉尔爵士的预言过于理想化了。自由主义者对此批评的回应是,自由主义者不认为国际关系中的持久和平是一蹴而就的。相反地,战争是重要的学习手段——只有当各国人民和领导者从战争的残酷中学到教训,他们才会回头审视自由主义商业和平理论的合理性。

安吉尔爵士的理论对商业和平模型的建立做出了两点重要贡献：第一，它确立了商业和平理论的基本分析对象（unit of analysis）是个人的利益（individual interests）。战争可以改变土地的归属，但很难改变人心的向背，因此不一定能为战胜国带来充分的利益。第二，它确立了贸易带来机会成本变化这一基本因果机制，成功揭示了康德未能清楚解释的“为什么”贸易会带来和平这一问题。这一机制在当代的西方商业和平论学者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商业和平理论中最重要的微观机制。

举例来讲，理查德·罗斯克伦（Richard Rosecrane）在1986年出版的《贸易型国家的兴起》一书中指出，二战后核武器的发展、小型自动武器的扩散（small arm proliferation）、民族自决观念和游击战等新概念的流行使得军事侵略和占领的成本进一步上升，而技术的进步和国际组织（例如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使得贸易的成本进一步降低。^① 正因如此，安吉尔爵士预言的机会成本变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了。罗斯克伦认为随着这样的技术进步，国家概念乃至国际关系基本架构（systemic structure）也会发生变化。国际社会中的大部分国家由强调对土地的控制的“领土型国家（territorial state）”逐步向强调对贸易的控制的“贸易型国家（trading state）”转化。贸易型国家占大多数的国际结构将会比领土型国家占大多数的国际结构更和平。^②

近年来，马克·布劳利（Mark R. Brawley）和戴尔·柯普兰德（Dale Copeland）等人的理论进一步发展了机会成本机制。^③ 他们的理论指出，预期贸易收益在国家的机会成本计算中可能比当前的机会成本结构影响更大。一战前夕德国选择与英国开战，并不是因为德国错误地计算了战争和贸易的机会成本，而是因为德国认为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未来从贸易中获得的利益预期将会下降，因此发展会受限。发动战争的决策在“长痛不如短痛”的冒险主义驱使下变成了理性的选择。^④ 这一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推翻了机会成本机制，并将自由主义理论和现实主义的权力转移理论结合了起来。战争或是和平贸易取决于国家是否对贸易中获得的利益感到满意，而这一满意度是由机

① 参见 Richard Rosecran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AZ: Basic Books, 1986.

② 罗斯克伦理论的重要贡献是他将个体（individual）和系统（system）两个不同层次的分析对象链接了起来，将强调个体的自由主义理论发展到了系统层面，回应了现实主义对自由主义“不能解释系统层面因素”的批评。这也可以看作自由主义学者进一步“科学化”其理论的努力。

③ 参见 Mark R. Brawley,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Revisited,” in Ersel Aydinli and James Rosenau, eds., *Globalization, Security and the National State*, New York City: SUNY Press, 2005, pp.67-80; Dale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0, No.4, 1996, pp.5-41; Dale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④ 参见 Dale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 pp.27-33.

会成本结构和预期共同决定的。这一理论对当今的世界显得特别重要——如果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广泛存在着对当前国际经济金融结构的不满和对国际贸易获利的悲观预期,参与全球化贸易并不能带来和平。如果崛起的新兴大国认为当前的国际经济金融结构不公平地为守成大国带来更多收益,而除了暴力手段不能改变这一现状的话,战争并不是不可能的。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国际结构和制度层面的公平正义,但不幸的是,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当代商业和平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一制度层面的公平性问题。本文认为,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商业和平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走入了歧途,违背了古典自由主义中公平正义的原则,也不反映崛起的发展中大国的利益需求。

三 商业和平论的当代发展:新自由主义和加茨基模型

当代的商业和平论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的话语工具。新自由主义一开始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从英美兴起的一套以自由市场为基本原则的经济政策。它的基本内容包括贸易与金融自由化,以市场为基本定价机制,私有化和抑制通货膨胀。^①新自由主义要求国家和政府应当尽量少地干预经济生活。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石在于(大型)企业应当能有效控制国际经济、用强有力的手段来支配国家政策制定以及有能力影响新观念和思想的形成和固化。^②在这一定义中我们已经能看到新自由主义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商业和平理论研究中的基本分析对象、对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理解以及微观因果机制三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基本的分析对象从早期模糊定义的理性个体(rational individual)转向利益驱动的企业。社会这一概念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并不存在,^③社会正义与公平也不在新自由主义分析中占有重要地位。国家概念也仅居于从属地位,其政策制定处于企业利益的影响之下。

第二,自变量从早期简单的国家间双边贸易量向新自由主义制度变量转换。举例来讲,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在被广泛引用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论文中明确指出,自由主义商业和平理论要求“在国际市场上所有的决定都应当处于国家可

^① Noam Chomsky, *Profit over People: Neoliberalism and Global Order*, New York City: Seven Stories Press, 1999, p.20.

^② Noam Chomsky, *Profit over People: Neoliberalism and Global Order*, p.20.

^③ “社会这一概念并不存在”即为撒切尔夫人在1987年的著名言论。

干涉的领域之外”。^① 帕特里克·麦克唐纳(Patrick McDonald)认为,国家操纵的贸易并不能带来和平,自由贸易才能带来和平。^② 麦克唐纳于2010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中研究了财产所有制与国家政策之间的关系,发现当私有财产得到保证的情况下,从贸易中获利的个体才有强烈的意愿去影响国家政策,希望国家保持和平的外交政策以确保个体的获利。^③ 麦克唐纳发现公有财产占主体的国家更容易卷入和他国的军事冲突。

第三,新自由主义强调企业或理性个体有动机也有强有力的手段来支配国家政策制定,这一假设则成为商业和平主义中关键的因果机制。例如,麦克唐纳对于财产私有制与和平政策相关性的研究强调理性个体在影响国家政策制定中的“搭便车”问题。任何影响国家政策制定的行为都是有成本的,在以公有财产为主体的情况下,从成本最小化出发的理性个体会强烈的“搭便车”的意愿。这一集体行动问题的最终结果会造成理性个体缺乏影响国家政策的动机和能力。^④ 只有在私有财产占主体的情况下,理性个体才有强有力的动机去确保自己的财产不被国家的侵略战争所破坏。但不幸的是,西方商业和平研究中鲜有直接针对这一关键机制的案例研究和微观过程追踪(micro process tracing),而是把这一假设当作理所当然。即便是麦克唐纳的研究也没能说明当国家政策制定不完全是被经济问题所支配的时候,商业利益对国家政策制定有多大影响力。在与民族主义、国家执政合法性、社会力量的不同诉求、精英集团的内部分配问题等诸多因素的博弈中,商业利益如何才能确保支配国家政策制定,西方商业和平理论研究对此过程往往语焉不详。

撇开这个因果机制的传导问题,更关键的挑战在于自由市场经济并不总是产生公共产品(public good),而是不时地产生公共损害(public bad)。乔格·索伦森(Georg Sorensen)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经济制度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不仅因为发达国家经常在全球经济治理中采取双重标准,而且因为自由主义的世界经济近年来制造了更多的“跨国界问题”,例如金融危机、政治动荡、环境污染以及非法跨国交易,包括走

① 该文已被学术界引用1800余次,是国际关系理论中高引用的代表性论文之一。参见 Michael Doyle,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p.1161。

② Patrick McDonald, "Peace Through Trade or Free Trade?"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8, No.4, 2005, pp.547-572.

③ 参见 Patrick McDonald, "Capitalism, Commitment and Peace,"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36, No.2, 2010, pp.146-168.

④ Patrick McDonald, "Capitalism, Commitment and Peace," pp.150-156.

私、洗钱和人口交易等。^①当发展中国家面临贸易的负面效应超过正面效应时,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应有拒绝自由市场确保国内稳定的权利;这一观点显然和新自由主义是有冲突的。康德在被奉为自由主义理论开山之作的《永久和平论》一文中指出,当贸易损害了他国利益的时候,该国应有权利拒绝被强加的国际贸易。^②在康德看来,殖民贸易就是典型的“非正义贸易”;只有双方权益得到保障的公平、正义的贸易才会带来和平。^③康德特别引用17世纪中国和日本以国家干涉来阻止西方殖民者强加于它们的殖民贸易,以此指出这样的国家干涉应该被看作正义和和平的。^④

古典自由主义对商业和平的理解是“公平正义的”贸易才会带来国际和平,不是“自由的”贸易就一定会带来和平。这一观点在微观层面上似乎也比自由主义商业和平能得到更多的理论支持。在微观层面上,某些个体从贸易中获利较多,但某些个体获利较少乃至利益受损。^⑤自由经济中输家的政治和社会权益如何得到保护?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固化是否会带来国内和国际层面上的和谐与和平?早在20世纪30年代,爱德华·卡尔(Edward H. Carr)就对此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卡尔认为自由市场必然会带来个体利益的同质化(homogenization of interests),个体需要将其原本多样化的政治和社会目标修改并统一到经济利益上来,这必将导致政治和社会权力的再分配,而这个过程不会是非常平稳的。自由市场所预言的最终“平衡和和谐是在长期的斗争和动荡之后才可能达到,而在这过程中伴随着很多个体从历史中被抹杀;自由市场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些弱者的牺牲之上,但我们也应记得,它们曾是和我们一样的社会个体,乃至兄弟姐妹”。^⑥

① Georg Sorensen, *A Liberal World Order in Crisis: Choosing Between Imposition and Restrain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p.43.

② Immanuel Kant, *Perpetual Peace: A Philosophical Essay*, p.84.另见 Paul Guyer, ed.,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nt and Modern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③ Immanuel Kant, *Perpetual Peace: A Philosophical Essay*, p.85.

④ 有意思的是,即便是亚当·斯密也对当时的西方殖民贸易有着诸多批评。在亚当·斯密看来,当时的西方贸易公司(例如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乃是“全球非正义的代理人”,这些公司不光损害被殖民地国家和社会,它们同样“绑架西方国家的政府,破坏殖民母国社会改良以及正义和公平的自我治理的能力”。在斯密看来,贸易确实可以带来和平,但这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从贸易中获得发展和力量并最终赶上先进国家这一可能性之上的。这是一个现实主义而非自由主义和平机制。参见 Sankar Muthu, “Adam Smith’s Critique of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mpanies: Theorizing ‘Globalization’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Political Theory*, Vol.36, No.2, 2008, pp.185-212。

⑤ 此即为国际贸易的分配效应。国际贸易一方面会带来全社会的收入提高,但另一方面会损害某些群体,例如本土生产效率较低的(comparative disadvantage)行业的利益。

⑥ Edward 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Macmillian, 1939, p.49.

当这一分配问题上上升到国家层面,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是否存在全球自由市场对某些国家结构性不利,而对某些国家结构性有利的情况?国家作为暴力的垄断机器,是否能和平地接受这样的结构性不公?崛起的发展中大国是否更应该关注贸易中相对获利(relative gain)问题,即谁得到了自由经济产生利益中的大头这一问题?流行于拉美的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就曾指出,全球经济结构建立和固化了经济核心(即发达国家)和经济边缘(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分工,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体系中只能出口低附加值初级产品,从而长期处于结构性的贫穷状态。^①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其曾于2014年掀起热烈讨论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也以翔实的数据指出,自由经济体系下资本的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收入不公平会逐渐累积最终带来政治和社会动荡。^②而且,如果把皮凯蒂的发现与经济学中的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结合起来,^③我们也会发现资本富集的国家在全球自由市场体系中获得的回报会高于其他生产要素(例如人口或土地)富集国家所获得的回报。如果说自由市场中作为输家的个体无力反抗整个体系就只能接受输家的命运,那么全球自由市场体系下成为输家的国家是否也甘心接受同样的命运,而非使用手中垄断的暴力手段进行反抗?

弗朗西斯科·古铁雷斯(Francisco Gutiérrez)总结了四点新自由主义政策可能会导致更多国内和国际冲突的因果机制。^④

第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进而引发社会动荡。

第二,“小政府”的政策偏好削弱国家和社会维持安全体系的力量。与之相关联的是私有化的深入会带来安全的私有化(the privatization of security),私人控制的暴力力量可能引发更多的冲突。

第三,在地方各种制度不完整、经济和文化发展程度不够的情况下由外界强行推动的民主化和经济地方化(decentralization)会引发寻租行为,导致地方割据和冲突。最终的结果不会是西方自由主义者们宣称的问题都解决,即所谓的“好事一起

① 关于依存理论,参见 Samuel Valenzuela and Arturo Valenzuela, “Modernization and Dependency: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in the Study of Latin American Underdevelopment,”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10, No.4, 1978, pp.535-557.

② 参见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oston: Belknap Press, 2014.

③ 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指出,相对价格的上升会影响生产中大量使用的生产要素的回报率。反映到国际贸易中,国家应该专注于能充分利用该国富集生产要素的产业。例如土地广袤的国家应专注于农业生产和出口,资本富集国家应专注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④ Francisco Gutiérrez, “Mechanisms,” in Francisco Gutiérrez and Gerd Schönwälder, eds.,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Violence: Utopia or Dystopia*, New York: Pluto Press, 2010, pp.13-49.

来(all good things come together)”,^①而是导致国家权力落入地方强人手中,引发更多的区域冲突。

第四,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结构带来国家层面上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导致经济民族主义的升温,进而带来国家间更大的敌意。

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来总结,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层面上,新自由主义都将制造出一个“失败者”群体。当这个群体长期被固定在国内和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底层,看不到变化的希望(即马克思所指的“异化”过程),他们则可能会使用暴力手段来改变当前的制度。^②综上所述,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很可能与暴力冲突正相关,而不像新自由主义理论宣称的那样会带来和平。

不幸的是,新自由主义和平理论的缺陷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一方面,西方学者将新自由主义理论广泛应用在商业和平研究中,进一步发展了经济上相互依存与和平等基本概念,从而阐明了基本概念之间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在方法论上,商业和平理论朝着科学化的方向大步前进,大型数据库和定量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埃里克·加茨基于2007年发表在《美国政治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上的论文《资本主义和平》,鲜明地体现了当代西方商业和平理论的这两个发展方向。^③

在这篇论文中,加茨基首先发展了自由主义中“相互依存”这一概念。^④他指出资本市场开放的国家能从国际投资中大量获益,而当国家试图采取侵略性的战争政策的时候,政治动荡带来的资本撤出同样会对国家造成极大的损失。因此资本市场越开放的国家,国内与国际资本市场的相互依存度就越高,也更倾向于采取和平的外交政策。为了证明这一观点,加茨基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度金融市场报告中搜集了世界各国从1950年到1990年间金融市场开放度数据,并将其与战争关联(COW)数据

① “好事一起来”即西方早期政治和经济发展研究中认为只要采取和西方一样的政治经济制度,所有西方社会所取得成就都可以整体被复制到发展中国家的思维方式。参见 Albert Hirschman,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② 古铁雷斯使用“剥夺民权(disenfranchisement)”一词来描述这个过程,此概念与马克思描述的政治和经济的异化不同之处在于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还伴随着文化乃至民族的异化和排斥过程。参见 Francisco Gutiérrez, “Mechanisms,” p.30。

③ 加茨基的论文获得了2007年度《美国政治学杂志》的年度论文奖。参见 Erik Gartzke, “The Capitalist Pea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51, No.1, 2007, pp.166-191。

④ 虽然资本主义和平的理论基础可以一路上溯到熊彼特的早期研究,但在加茨基的资本主义和平研究之前,自由主义商业和平理论中的相互依存一般指的是贸易上的相互依存,这和早期国家间经济联系主要体现为货物贸易也是有关的。随着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兴起,国际资本市场统合度提高,资本市场相互依存对和平的影响开始进入商业和平理论研究的视野。

库等定量和平研究中的标准数据库合并,使用标准的时序—截面定量分析方法进行测量。^① 他的研究结果显示出金融市场越开放,两国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②

布鲁斯·拉西特(Bruce Russett)和约翰·奥尼尔(John Oneal)的自由主义三角和平理论^③为自由主义范式下的定量分析建立了一个标准化的模型,其后的商业和平定量模型大多建立在对拉西特和奥尼尔的模型的修改和调整之上。加茨基的资本主义和平模型即是如此,其定量模型为:

$$\begin{aligned} \ln[(P_{ij,t})/(1 - P_{ij,t})] = & \beta_0 + \beta_1(DemocracyLow_{j,t-1}) + \beta_2(DemocracyHigh_{j,t-1}) \\ & + \beta_3(TradeDependenceLow_{j,t-1}) + \beta_4(CapitalOpenness_{j,t-1}) \\ & + \beta_5(Contiguity_{ij}) + \beta_6(Log_Distance_{ij}) + \beta_7(MajorPower_{ij}) \\ & + \beta_8(Alliance_{j,t-1}) + \beta_9(Capacity_{i,j,t-1}) + \beta_{10}(Development_{i,j,t-1}) \\ & + \beta_{11}(S - Score_{j,t-1}) + \beta_{12-17}(RegionDummy_{ij}) \\ & + \beta_{18-20}(TimeSplines) + \sigma^{\text{④}} \end{aligned}$$

其因变量中 $P_{ij,t}$ 即表示在 t 时间点两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其他各自变量定义及其测量方法见表 2 总结。

在这些变量的基础上,加茨基使用标准的基于二元因变量的时序—截面模型(Binary Time-Series-Cross-Section,简称 BTSCS)来控制时间上数据相互影响的问题。^⑤ 加茨基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度与军事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显著负相关。加茨基对主要变量采用了不同的数据来源和测量方法来测试其结论的健壮性(robustness)。举例来讲,加茨基使用了资本市场研究中被广泛使用的陈—伊藤指数(Chinn-Ito Index)^⑥量表来

① 关于加茨基所使用的方法和数据的细节问题及相关批评将在本文第三节详细讨论。

② 加茨基的另一关键发现是当金融市场开放度变量得到控制后,民主政体对和平的显著影响消失了。这意味着被广泛观测到的民主国家间的长期和平并不是因为民主的原因,而是因为这些发达民主国家大多采取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并开放金融市场。它们之间的和平不是因为民主政体天生就比较和平,而是因为资本市场相互依存带来的“绑定”效应。这一发现对西方流行的民主和平理论形成了直接挑战。此发现并非本文中心论点,故在此略过。

③ Bruce Russett and John O'neal, *Triangulating Peac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④ 加茨基在其论文中并没有专门讨论随机干扰项是否存在异方差性和自相关性,而是强调其模型直接继承自拉西特和奥尼尔的经典模型。但本文后文讨论中将会指出,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正是加茨基数据和模型中的一大弱点。参见 Erik Gartzke, “The Capitalist Peace,” p.173.

⑤ 关于 Binary TSCS 模型,参见 Nathaniel Beck, Jonathan Katz and Richard Tucker, “Taking Time Seriously: Time-Series-Cross-Section Analysis with a Binary Dependent Variabl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2, No.4, 1998, pp.1260-1288.

⑥ 陈—伊藤指数同样是使用 IMF 年度报告统计出的关于各国资本管制政策的数据。此数据的最大优点在于它是免费公开的,而 IMF 年度报告需要另行购买。加茨基发现此变量和他所使用的资本市场开放度变量高度相关,可以用于取代他使用的基于 IMF 年报的数据,置换后也不会影响最终结论。

取代原来的 IMF 年报数据,但此不同度量得出的资本市场开放度依然显示与军事冲突显著负相关。

表 2 加茨基资本主义和平模型变量组成

变量类型	变量名	数据来源	定义与测量方法
因变量	军事冲突(MIDs)	COW Data, DY MID (Maoz' Dyadic MID Data)	有军事力量卷入的两国间冲突,造成少于 1000 人死亡;超出 1000 人死亡的冲突被定义为战争
主自变量	资本市场开放度 (capital openness)	IMF Annual Report on Exchange Arrangements and Exchange Restriction	参见 IMF 年度报告。资本市场越开放,在此变量中获得赋值越高
控制变量	贸易相互依存 (trade interdependence)	COW Data	双边贸易总量除以该国 GDP,得出贸易总量占经济总量比重
	民主度 (democracy low and high)	Polity IV 或 Freedom House Data	0—10,数值越高该国政体越民主。数据参见 Polity IV 数据库
	发展程度 (development)	COW 4.0	人均 GDP,取对数
控制变量	国家利益相似度 (S-Score)	S Score	按照各国在联大等国际组织投票相似度等数据得出的两国兴趣利益相似度标尺
	地理接壤 (contiguity and distance)	COW 4.0	0—1 变量。1 表示两国接壤,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提高
	霸权 (major power)	COW 4.0	1 表示该国为主要霸权国家
	军事结盟 (alliance)	COW 4.0	某两国配对中任一国与他国存在军事结盟关系,该变量为 1
	国家能力 (capacity)	COW 4.0	源自战争关联数据库,衡量各国总人口、城市人口、能源消耗、钢产量、军费等占世界总量的百分比
	地区 (region)	COW 4.0	如两国同属同一地区,则赋值为 1

资料来源:此表中所列出的变量详细信息及其与因变量(MIDs)之间的关系参见 Erik Gartzke, "The Capitalist Peace," pp.174-176; Curtis Signorino and Jeffrey Ritter, "Tau-b or Not Tau-b: Measuring the Similarity of Foreign Policy Posi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3, No.1, 1999, pp.115-144。

注:交互效应(interaction effect)以及其他用于控制时序数据影响的变量未在此表中列出。

在下文中,我们将采用混合分析方法(结合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对以加茨基模型为代表的商业和平论提出批评。

四 商业和平论：基于定量模型的反驳

在《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一书中,加里·金(Gary King)、西德尼·维伯(Sidney Verba)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以下简称KKV)定义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包含以下四个特征:(1)研究目的是推理因果关系;(2)研究过程须公开、可复制;(3)结论带有不确定性;(4)关键在于方法而非结论。^① 加茨基遵循了这些科学研究的原则,将其数据和源文件在其网站上全部公开的做法为其他学者检验其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② 而其结论中带有不确定性也意味着,由于可能存在的模型不完善和数据不完整,资本市场开放度和国际和平之间的关联性尚待将来更多的科学研究来证实。本文后续内容将在严格遵守KKV的科学方法论的条件下分析加茨基的模型和数据,本文认为加茨基的研究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加茨基的实证研究存在数据不完整的问题。加茨基所使用的IMF年报中有大量数据缺失,一些主要国家如中国、苏联、朝鲜、越南、安哥拉等缺乏资本市场开放度数据。这些丢失的数据导致加茨基数据库中有高达39%的观察值(observations)没有被使用到最终模型中。^③ 换句话说,加茨基的资本主义和平模型只对IMF有数据的3/5的国家适用,而不是对所有国家都适用。更关键的是,加茨基的数据缺失是非随机性的。上面列出的国家在加茨基所测试的时间段(1950—1992年)内大多与外国经历了多次军事冲突。换言之,加茨基数据中缺失的国家与军事冲突存在显著正相关。将这些显著正相关的数据点排除在最终模型之外会导致最后结论中包含系统性偏差(systemic bias)。

其次,加茨基的实证研究面临概念测量不准确的问题。如果概念测量的操作化过程中存在问题,那么这一概念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和因果性也可能存在问题。加茨基的数据库包含了20世纪50年代至1990年间各国资本市场开放度的数据,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尼克松将美元与黄金脱钩之间,国际资本市场处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严格管理之下。而在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国际资本市场的生态系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带来了两个研究上的问题。第一,新

^① Gary King, Sidney Verba and Robert O. Keohane,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7-9.

^② 加茨基使用STATA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相应的分析源文件和数据包在其网站上可下载:<http://pages.ucsd.edu/~egartzke/>。

^③ 详细内容请参考Allan Dafoe, "Statistical Critiques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Caveat Empto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55, No.2, 2011, pp.247-262.

自由主义时期(20世纪80年代后)对资本市场开放的定义和理解可能不适用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①第二,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各国资本市场开放度变量方差(variance)偏小,有犯“第二型错误”的风险。^②事实上,我们将加茨基数据中衡量资本市场开放度的关键变量按时间拆分为两个变量(即1971年前各国资本市场开放度和1980年后各国资本市场开放度),我们会发现第二个变量均值和方差均较第一个变量有明显上升,意味着1950年到1971年间各国资本市场开放度总体较低,而国家间差异也较小。^③

简言之,加茨基对其模型关键自变量(资本市场开放度)的处理存在两个潜在的问题:一是概念的过度延伸(the overstretch of concept),二是数据的系统性缺失。本文试图通过将检验的时间段改为1990年以后来修正这两个问题。本文使用的数据检验的时间段是1990年至2004年。^④测试时间段起点选择在1990年有两个好处:第一,可以避免诸如冷战结束和新自由主义流行等全球系统性变量对因变量(和平与冲突)的影响,从而避开一些潜在系统性变量未受控制的问题。第二,这个时间段内各主要变量的数据完整性大大提高,较少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主要国家如苏联和中国的缺失问题。

再次,加茨基对资本市场开放度的操作化处理存在问题,即过度关注了政策制度而忽略了实际市场中的资本流动带来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商业和平理论的因果机制。传统的商业和平因果机制的关键是国家间商业利益交换的量越大,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性就越强,国家越是不愿因为战争而失去这样大量的利益。^⑤换句话

① 换句话说,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资本市场与和平之间的因果机制可能更应归结为国际制度(institutionalism)的良好管理,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宣称的从资本开放和自由流动中获利的个体驱使国家采取和平的外交政策。在这期间资本流动是在国家和国际组织管理之下的,不应和新自由主义时期的资本流动作为同一概念处理。

② 第二型错误(type II error)即将本来不显著相关的变量误判为相关。由于1971年前各国资本市场开放度变化不大,此变量在此期间与冲突的关系可能并不显著。

③ 1971年前各国资本市场开放度 capopenL 变量均值为 2.48(0 为最小值,10 为最大值),方差为 1.49。1980 年到 1992 年间(新自由主义时代),各国资本市场开放度变量均值为 3.23,方差为 1.63。

④ 本文使用数据截止到 2004 年是因为当前战争关联数据库中因变量(MIDSs)只更新到 2004 年。但这也带来了时序—截面数据中年份值偏小(T=15)的问题。年份值偏小可能带来数据中时间上的相互依存性(temporal dependence)没有得到较好控制的问题。按照时序—截面数据标准处理办法,本文使用了不同的方式来控制时序上的相互依存性,并观察在不同的时序处理方法之下本文的数据分析结果是否发生变化。我们发现,本文的结论在所有时序控制方法之下均成立。此分析过程详情请参见附录。

⑤ 实际上,传统的商业和平模型中对贸易变量的操作化过程严格遵循这一对实际贸易量的强调。凯瑟琳·巴比里认为国际贸易对于安全政策的影响关键在于两点:第一,两国间贸易相互依存是否平衡。第二,两国间贸易总量对各自经济影响力有多大。由此可以用 A、B 两国间贸易总量除以 A 国所有对外贸易量,获得两国间贸易对 A 国经济的影响(TradeShare_a),同样方法可获得两国间贸易对 B 国的影响(TradeShare_b)。这两个值的乘积再开方即反映两国间贸易对各自经济的影响力,而这两个值之差的绝对值即反映两国贸易的平衡度。巴比里这一处理方法对贸易和平模型有较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业界标准。实际上,传统的商业和平理论模型中鲜有使用制度变量来衡量贸易与和平之间的关系的,总量大小一直是商业和平因果机制中的关键点。参见 Katherine Barbieri,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 Path to Peace or a Source of Interstate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33, No.1, 1996, pp.29-49。

说,国家间实际的商业利益流量很关键。但加茨基所使用的资本市场开放度变量是一个关于各国政府是否在“外汇、现金和资本账户上采取限制性政策”的集合,^①是一个政策的度量而不是国家间实际资本流动的度量。资本市场政策制度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和实际资本流量正相关,但两者间的因果关系可能受大量的潜在变量的影响。举例来讲,某些国家虽然对资本流动控制较少,但由于其本身国家能力或经济发展程度有限,并不能吸引来大量的外国投资,这就导致加茨基的新自由主义制度变量与实际资本流动之间的脱钩。然而资本主义和平要求从大量资本自由流动中获益的资本家主动采取措施影响政府政策,这一因果机制在前述情况中并不成立。

最后,加茨基使用的新自由主义制度变量还会带来因果内生性的问题(*causal endogeneity*)。通常获益者游说政府是商业和平的关键机制,但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开放政策乃是全球资本游说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因此,将资本市场开放政策放在自变量一边是值得商榷的。从收益—成本比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出发,在自由流动中获利的资本应当专注于其收益最大化而不是花成本去提供政治秩序、社会公义等公共产品。当政治动荡来临之时,可以自由流动的资本最合理的选择不是去游说政府保持和平的内政外交政策,而是转移到政治相对稳定的地区去。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资本不正常的大量流动是和政治动荡及安全冲突正相关的,而资本市场的缺乏管制为这样的大量流动打开了方便之门。

鉴于上文提到的这些问题,与加茨基所期待的资本市场开放带来和平不同,本文提出一条资本市场开放与政治动荡之间的充分因果机制: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带来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政府和社会安全力量的削弱、地方割据和地区强人的寻租现象以及经济民族主义的升温,最终可能带来政治动荡和安全形势恶化。如果资本可以完全自由流动,出于成本最小化的考虑,自由流动资本在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会选择撤资到政治安定的地区,而不是去影响政府的安全政策制定。据此我们可以推出一个和加茨基资本主义和平理论相反的假说: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之下,大量资本在缺乏管制的情况下流入或流出一个国家可能会带来经济和政治的动荡,进而造成安全风险上升。

使用实证数据测试这一假说的关键点,在于使用实际的资本流入和流出量与加茨基的制度变量共同测量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国际和国内安全的影响。实际上,不受控制的资本外逃(*capital flight*)对国内安定和国家安全政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综上所述,本文将在两个方面对加茨基的资本和平模型做出改进:第一,测试的时间段改到较晚的1990—2004年间。第二,引入资本实际流动变量。除此以外,本文还使用了混合方法

^① Erik Gartzke, “The Capitalist Peace,” p.174.

(mixed methods)来解决定量研究中常常面临的“相关但不因果”问题,应用过程追踪(process-tracing)方法,以20世纪70年代末的阿根廷为例来呈现资本市场开放与政治动荡之间的因果关系。下面展示的是通过改进加茨基的模型而建立的一个新的理论模型。^①

表3 新模型所使用的基本数据及来源

变量名	取值范围	均值	方差	样本数	数据来源	说明
军事冲突 (Mids)	0—1	0.0036	0.059	185632	战争关联 4.0 ^②	因变量,1表示两国间发生了军事冲突 ^③
民主 (低值)	1—10	2.78	3.28	185646	Polity IV 数据库 ^④	两国中较不民主一国的政体民主程度。1表示不民主,10表示民主。民主和平理论认为此变量为影响两国间冲突可能性的关键变量
民主 (高值)	1—10	7.42	2.99	177273	Polity IV 数据库	两国中较民主一国的政体民主程度
两国政体 差异	1—10	4.57	3.32	177273	Polity IV 数据库	用民主—高值减去民主—低值,得到两国间政体差异。崔承焕(Seung-Whan Choi)提出两国政体差异越大,发生意识形态战争的可能性越大。 ^⑤ 此变量应与军事冲突正相关

① 加茨基模型中还有另外一些受到学者们批评的地方。举例来讲,阿兰·达福认为加茨基对数据时序上相关性(temporal dependence)的处理有问题。本文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是采用了三种不同的时序数据处理办法:加茨基使用的三次样条(Cubic Spline)办法、柯蒂斯·西格诺里诺和杰弗里·里特提出的时间平方和立方项方法以及年度固定效应方法(yearly fixed effects)来测试不同的数据处理方法对结果的影响,最终不同模型的结果并没有显著不同。参见Allan Dafoe, “Statistical Critiques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Caveat Emptor,” pp.247–262; Curtis Signorino and Jeffrey Ritter, “Tau-b or Not Tau-b: Measuring the Similarity of Foreign Policy Posi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3, No.1, 1999, pp.115–144。另外,加茨基模型中使用的因变量“军事冲突(MIDs)”将国内冲突排除在外,只考虑了国际冲突的情况。这一点已经受到广泛批评。但因为这一因变量来自在安全问题定量分析中得到广泛应用的“战争关联”数据库,在战争关联数据库完善其数据并加入国内冲突的数据之前,本文暂时沿用加茨基对因变量的处理办法。

② 战争关联数据库的codebook和免费数据可在其网站上下载:<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③ 如前文脚注中所指出的,这一变量作为国际和平和冲突的度量受到了广泛的批评。此外,该变量也没有关于“谁发起挑战破坏和平”的信息,0—1的取值过于简单,不能反映冲突的严重程度,不能反映随着时间进程冲突的缓和或者加剧。这些都是战争关联数据库中尚待改善的地方。本文在此暂时沿用加茨基使用的战争关联数据库。

④ Polity IV是民主研究中广泛使用的关于民主度的变量。其数据可在其网站上下载:<http://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polity4.htm>。

⑤ Seung-Whan Choi, “Re-Evaluating Capitalist and Democratic Peace Model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Quarterly*, Vol.55, No.3, 2011, pp.759–769。

续表 3

变量名	取值范围	均值	方差	样本数	数据来源	说明
贸易相互依存(低值)	-9.87—16.13	0.26	0.53	185652	战争关联 4.0	此变量取值越高,意味着两国间贸易上相互依存度越高
资本市场开放度	-1.84—2.48	-0.58	1.22	181330	陈—伊藤指数	同样基于 IMF 年度报告的关于各国资本管制政策的变量。负值表示该国采取严格的资本管制
资本净流入量占 GDP 百分比	-54.36—43.59	-0.0996	3.2	114632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WDI) ^①	计算方法参见正文说明。负值表示资本净流出,正值表示资本净流入
人均 GDP (取对数)	4.16—11.46	6.75	1.27	184838	战争关联 4.0	按当年美元计算。此值有一年前置量,即假定经济发展情况需要一定时间来影响未来政策制定
资本净流入量(缺失数据)	0—1	0.38	0.49	185562	世界银行 WDI	此变量为 1,表示该国在该年资本流入流出数据缺失,不计入最终模型内。此变量用于控制缺失数据的影响,确保结论的健壮性
国家物质力量	0.000001—0.14	0.001	0.0027	185562	战争关联 4.0	计算方法参见战争关联网站。此百分比为该物质力量占世界总量百分比
国家兴趣相似度	-0.34—1	0.71	0.27	185562	EUGene,S-Score	正值表示两国兴趣类似,负值反之
结盟	0,1	0.05	0.07	185562	战争关联 4.0	1 表示存在军事结盟
超级大国	0,1	0.07	0.26	185562	战争关联 4.0	1 表示两国间至少有一国是超级大国。关于超级大国定义,参见战争关联网站
接壤	0,1	0.02	0.13	185562	EUGene	1 表示两国陆地接壤,发生冲突可能性上升

表 3 总结了本文定量模型中使用的数据来源及取值范围、均值、方差等统计描述。为保证研究的继承性和严谨性,本文除了引入的新变量之外沿用了加茨基所有变量的

^① 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原始数据可在其网站上下载: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数据来源,只是将数据取值范围改为1990—2004年间。时间截至2004年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战争关联4.0数据库中目前关于因变量(军事冲突)的数据仅更新到2004年。数据结构与加茨基的资本主义和平数据完全一致,数据中每个观察点代表一个国家,A—国家 B—年份,整个数据库中共有185652个数据点。

资本净流入量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百分比是本文引入的关键变量。在WDI中有多个变量可用作资本实际流入流出的度量,我们最终选择的是私人资本净流入占GDP百分比这一变量。两个原因导致了这个数据可能是WDI中对资本市场自由流动的最好描述:第一,和其他资本市场流动的度量比较起来,这一数据的完整性最好。^①第二,私人资本可能是对国内国际安全局势最敏感的群体,也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反应最敏感的群体。在WDI中,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数据完整性要比私人资本流动这一变量更好,但直接投资与和平之间的因果机制可能更反映传统的商业和平理论(即直接投资带来和平),^②而不是本文期待的新自由主义资本流动对和平的负面影响。这是因为直接投资使得外国资本被“固定”在被投资国,成为一项不能移动的沉没成本。这一沉没成本使得投资者有充分的动力去影响投资和被投资国保持和平的安全政策。相对而言,在完全自由流动的市场环境里面,私人资本会在政治动荡的时候快速撤离到相对安全的国家去,因此这一“游说政府保持和平的安全政策”机制并不成立。^③

在资本流入量占GDP百分比数据基础上,我们使用在 t 年的资本流入量占GDP百分比除以上一年($t-1$)的资本流入量,得到两年间资本流入量的变化量。资金的突然大量流入可能代表着国际热钱投机行为,而大量资金的突然流出则可能代表着资本外逃,因此我们期待这一变化量与经济和社会动荡相关。据此,本文提出的模

① 其他资本市场自由流动的度量包括股票市场(stock market)净流入资金占GDP的百分比,债券期货市场(portfolio market)净流入资金占GDP百分比,外国直接投资(FDI)占GDP百分比,政府融资(financing)占GDP百分比。在这些变量中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政府融资的数据完整性较差。在融合形成最终数据后,此三变量的完整性均在40%左右,导致最终数据库中超过一半的数据点不能使用到最终模型中,其中政府融资一项甚至有超过80%的数据缺失。相比较之,私人市场资金流动量这一数据达到了60%以上的完整性。对于私人市场资金流动量中缺失的国家和数据,我们尝试使用简单的估算赋值(imputation)的方法来测试这些缺失数据是否带有系统性偏见,其结论是这些缺失数据的影响被控制以后并不会改变本文的最终结论。关于我们使用的估算赋值方法的细节,请参见附录。

② Solomon W. Polachek, Carlos Seiglie and Jun Xiang,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Ca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crease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in Michelle R. Garfinkel and Stergios Skaperdas,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Peace and Conflic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733–762.

③ 由于国家经济体量的不同,同样的资本流入量可能对不同国家造成不同的冲击。为此我们使用净资本流入量除以当年GDP,以此百分比作为资本流入量的度量。另外,与其他经济类变量一样,此变量有一年的前置期,这是因为经济类变量对政策产生影响需要一定的时间,依据此类模型的传统,此时间间隔被设置为一年。

型可记为:

$$\begin{aligned} \ln[(P_{ij,t})/(1 - P_{ij,t})] = & \beta_0 + \beta_1(\text{DemocracyLow}_{ij,t-1}) + \beta_2(\text{RegimeDif}_{ij,t-1}) \\ & + \beta_3(\text{DemocracyLow}_{ij,t-1}) * (\text{RegimeDif}_{ij,t-1}) \\ & + \beta_4(\text{TradeDependenceLow}_{ij,t-1}) + \beta_5(\text{PrivateCapital}_{ij,t-1}) \\ & + \beta_6(\Delta\text{CapitalFlow}_{ij,t-1}) + \beta_7(\text{CapitalOpenness}_{ij,t-1}) \\ & + \beta_8(\text{Contiguity}_{ij}) + \beta_9(\text{Log_Distance}_{ij}) + \beta_{10}(\text{MajorPower}_{ij}) \\ & + \beta_{11}(\text{Alliance}_{ij,t-1}) + \beta_{12}(\text{Capacity}_{i,j,t-1}) + \beta_{13}(\text{Development}_{i,j,t-1}) \\ & + \beta_{14}(S - \text{Score}_{j,t-1}) + \beta_{15-20}(\text{RegionDummy}_{ij}) + \beta_{21-23}(\text{TimeSplines}) \\ & + \beta_{24}(\text{CapitalFlowMissing}_{ij,t-1}) + \sigma \end{aligned}$$

其中黑体部分系本文在加茨基模型基础上做出的改进。为确保知识的继承性和与前人研究的可比性,本文完全沿用了加茨基模型的估算方法,即使用 Huber/White Robust Standard Error 的 Logit 回归,^①加上按照纳撒尼尔·贝克(Nathaniel Beck),乔纳森·卡茨(Jonathan Katz)和理查德·塔克(Richard Tucker)提出的用时间样条(Time Splines)来控制时序相关性的估算方法。^② 本文分析使用 Stata 14.0 版本。

多重共线性问题是回归模型必须要解决的前提假设。如果两个自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则最终的估算结果会有偏差。加茨基测试了所有自变量之间的两两相关性,其结论是所有自变量之间的两两相关性并不高。最高的自变量间共线性出现在国家兴趣相似度与民主高值变量间,为 29%。其他主要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度均在 15% 左右。我们使用了加茨基同样的方法来测试本文模型中所有变量的线性相关度,最终结

① Huber/White Robust Standard Error 不需要随机项正态分布,分布各向同性等传统回归模型必须满足的假设。在这些经典回归假设不满足的条件下,Huber/White Robust Error Estimation 方法依然可以得到可供假设检验的标准误,因此这一方法在数据间依存性很难排除,数据不严格正态分布,模型可能存在不足等复杂数据分析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加里·金和玛格丽特·罗伯特斯总结了 Huber/White Robust Error 常见的使用情况,其中就包含了二进制时序—截面数据分析,也即本文和加茨基所使用的数据结构。参见 Gary King and Margaret E. Roberts, "How Robust Standard Error Expose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They Do Not Fix,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Political Analysis*, Vol.23, No.2, 2015, pp.159-179。

② 在较早期的商业和平模型中,布鲁斯·拉西特(Bruce Russett)和约翰·奥尼尔(John Oneal)也提出广义估计方程(GEE)估算方法能很好地使用 AR1 时序模型来控制时序上的相关性。在按照纳撒尼尔·贝克、乔纳森·卡茨和理查德·塔克提出带时间样条(Time Splines)的 Logit 估算方法(简称 BKT 方法)即能很好地控制 TSCS 数据时序相关性之后,BKT 方法成为二进制因变量 TSCS 分析中的标准方法,参见 Nathaniel Beck, Jonathan Katz and Richard Tucker, "Taking Time Seriously: Time-Series-Cross-Section Analysis with a Binary Dependent Variabl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2, No.4, 1998, pp.1260-1288。加茨基使用两种方法测试了其分析结果,结论是两种方法得到的结论相同,而 GEE 方法得到的结论对商业和平的支持更强,因此在加茨基论文中只汇报了使用 logit 方法估算的结果,参见 Erik Gartzke, "The Capitalist Peace," p.174, p.178。

论也与加茨基相同。^①

首先,模型1完整地重现了加茨基的资本主义和平模型,但是其关键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开放度变量是与国家间冲突正相关的,这和加茨基的结论刚好相反。由于本文数据选取的时间段和加茨基数据的时间段重叠很少,此结果差异也可理解为在加茨基测试的时间段,资本市场开放政策确实可能和冲突负相关,但在我们测试的时间段,资本市场开放度与冲突变为正相关了。对于这一变化可能有很多解释,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对自由主义和平理论的批评可以提供一些借鉴。莱恩认为自由主义和平理论和实证受困于因果内生性问题,即我们在1990年前观察到的民主或商业和平不是因为民主和商业会带来和平,而是因为一个奉行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全球霸权的“向心”作用;换言之,这是一个现实主义的霸权和平,而不是自由主义的民主和平或者资本主义和平。^②而在冷战后,全球霸权推行民主和资本市场开放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民主干涉实际上带来了更多政治动荡,而本文所发现的这一相关性说明了在后冷战时代,资本市场自由化也是与政治动荡和安全问题正相关的。

表4 使用二元因变量时序—截面 Logit 回归方法估算军事冲突可能性分析结果

自变量	模型1:加茨基资本主义和平模型	模型2:崔承焕改进的资本和平模型	模型3:对模型2的进一步改进	模型4:引入资本流动量变量
国家配对中民主—低值	-0.093*** (0.021)	-0.036 (0.028)	-0.144*** (0.041)	-0.088* (0.042)
国家配对中民主—高值	0.054*** (0.017)			
两国意识形态差距		0.058** (0.027)	-0.002 (0.029)	0.019 (0.032)

^① 举例来讲,在本文数据中民主低值与资本市场开放度之间相关性为9%,与资本实际流入量之间相关性为2%,与贸易依存度之间相关性为13%。资本实际流入量与贸易量之间相关性为-2.8%,与资本开放制度之间的相关性为2%。为节约空间,详细数据表格可向笔者获取。加茨基的方法虽然能提供一个直观的统计数据来解决自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但仍有大量批评性地指出其自变量中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举例来讲,经济发达国家可能大量依赖于国际贸易,因此发展程度变量与贸易依存度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近年来,包括加茨基在内的诸多商业和平研究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使用了更新的同时估计模型(Simultaneous Estimation Model)来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哈弗德·赫格雷、约翰·奥尼尔和布鲁斯·拉西特使用了SEM模型重新估算了拉西特和奥尼尔的自由主义和平模型之后的结论是,自由主义和平在新模型下依旧成立。参见 Håvard Hegre, John Oneal and Bruce Russett, "Trade Does Promote Peace: New Simultaneous Estimates of the Reciprocal Effects of Trad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47, No.6, 2010, pp.763-774。

^② 参见 Christopher Layne, "Kant or Cant: The Myth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2, 1994, pp.5-49。

续表 4

自变量	模型 1: 加茨基资本主义和平模型	模型 2: 崔承焕改进的资本和平模型	模型 3: 对模型 2 的进一步改进	模型 4: 引入资本流动量变量
民主低值与意识形态差距的交互效应			0.061*** (0.012)	0.049*** (0.012)
净资本流入量占上年 GDP 百分比				0.113*** (0.036)
净资本流入量变化程度				0.075** (0.028)
资本流入数据缺失				-0.700*** (-0.155)
新自由主义市场开放制度	0.112** (0.047)	0.112*** (0.048)	0.108*** (0.047)	0.076 (0.051)
贸易相互依存 (低值)	-0.092*** (0.025)	-0.094*** (0.026)	-0.129*** (0.028)	-0.268** (0.103)
人均 GDP (取对数)	0.529*** (0.071)	0.531*** (0.071)	0.580*** (0.071)	0.482*** (0.072)
国家物质力量指数	30.1736** (9.5465)	30.130** (9.557)	27.762** (10.632)	25.534** (12.378)
国家兴趣相似度	-0.776** (0.260)	-0.774** (0.260)	-0.648** (0.269)	-0.891** (0.275)
结盟	0.065 (0.400)	0.065 (0.400)	0.162 (0.430)	0.170 (0.461)
超级大国	0.801** (0.258)	0.797** (0.258)	0.770** (0.260)	0.821** (0.266)
领土接壤	9.698*** (0.816)	9.731*** (0.824)	9.610*** (0.829)	9.402*** (9.852)
常量	-8.465*** (0.556)	-8.525*** (0.569)	-8.805*** (0.567)	-7.936*** (0.592)
N 值	178914	173211	173211	155827

注: 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误; *、**、*** 分别代表 P 值在 10%、5%、1% 的程度上显著。

模型 2 和模型 3 是对民主和平部分的一些改进, 数据结果也符合模型的预期。崔承焕在其对加茨基的批评中指出加茨基模型的民主和平部分有缺陷。^① 加茨基模型

① 参见 Seung-Whan Choi, "Re-Evaluating Capitalist and Democratic Peace Models," pp.759-769.

中的民主和平部分认为,一个国家配对中的民主程度低值越低,两国越容易发生冲突。而崔承焕认为民主和平的关键在于两国政权意识形态的差异,反映为两国政权民主度的差值。举例来讲,他认为两个民主度分别为0和10的国家配对,它们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要大于一个民主度为0和1的国家配对,尽管这两个配对中民主度的最低值都是0。崔承焕将这一变量称为“民主差异”。本文建立的模型2即崔承焕提出的此改进模型。

模型3是本文对崔承焕模型的进一步改进,其核心思想在于民主差异值变量与国家配对中民主度较低值变量间存在交互效应(interaction effects)。举例来讲,同样的5的差值,一个由民主度为-10和-5的国家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要大于一个由民主度5和10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本文模型3即测试了这一交互效应的引入是否会对资本主义和平的结论造成影响。

最终的模型4是本文要测试的关键模型。在前述模型的基础上,模型4引入了三个关键变量:资本流入量、资本流入量变化量、资本流入量数据缺失(用以控制丢失数据带来的影响)。^①这个模型的结果反映了两个关键问题:首先,当我们引入资本实际流动量的几个变量之后,加茨基的关键变量——资本开放制度——失去了其显著性。这意味着资本开放制度变量与安全冲突之间可能的因果相关性被资本流动量变量“拿走了”。其次,所有的资本流动量变量都和我们期待的一致,与冲突显著正相关。当一个国家资本流动量越大,其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当一个国家短期内资本流动量的变化量越大,该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越大。在基于模型4的预测基础上,我们还进行了一个模拟现实估算(post-estimation simulation)。当我们把中美两国于2004年的实际数据代入这个模型中进行预测,可计算出当年两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0.58%。如果我们设置一个虚拟现实,在这个虚拟现实中所有其他变量不变,只是把两国间私人资本流动量从实际的2.73调整到本文数据中观察到的最大值44,那么模型4计算出在这个虚拟现实之下两国当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是18%,提升了31倍。

^① 关于模型4,有三点需要说明:(1)我们使用了多个估算缺失数据的方法来测试缺失数据对结论的影响。这些估算方法的细节请见附录一。(2)模型4使用了BTSCS方法来控制时序和空间上数据点之间的相关性。学术界对于什么是最合适的控制时序和空间相关性的方法有争议,我们尝试使用了三种不同的方法来控制时序和空间相关问题,其详细过程及结果在附录二中。(3)对于引入这三个资本实际流动量变量是否确实能改进原有模型的问题,我们对这三个变量做了标准的受约束的F检验(restricted F-test),测试的结果是F检验的P值小于0.0001,加入这三个变量能显著改进原始模型。

五 商业和平论：基于案例研究的反驳

1976年阿根廷发生军事政变,前阿根廷总统胡安·多明戈·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的继任者、其夫人伊莎贝尔·马丁内斯·德·庇隆(Isabel Martínez de Perón)被软禁,军方领袖豪尔赫·拉斐尔·魏德拉将军(Jorge Rafael Videla)自任阿根廷总统。新成立的军事独裁政权一方面继续开展“肮脏战争(Dirty War)”,^①另一方面着手开展所谓的国家重组进程(national reorganization process),对阿根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进行严密掌控和重新调整。军人独裁政权的出现,一开始是满足了阿根廷人民对国内秩序的政治要求,但是随后的国家重组进程并没有显著改善阿根廷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发展状况。正相反,从1976年军人上台到马岛战争爆发以及阿根廷战败,阿根廷的经济政策因为信奉新自由主义信条,导致资本市场对外自由开放,外资疯狂参与阿根廷的内部投机活动,实体经济逐渐凋敝,贫富差距和贫困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并最终传导到了政治领域,为了转移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矛盾,军政府不顾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调停,执意与英国发生冲突,结果导致了更大的失败和军政府在1983年被推翻。下文将详细展示对外金融和经济联系如何在一定条件下会促使一国采取冲突和战争的对外政策。

20世纪70年代的阿根廷通货膨胀严重,经济衰退导致国际收支长期不平衡。为了改善国内的经济状况,魏德拉任命何塞·奥斯(José Alfredo Martínez de Hoz)为经济部长。奥斯上任之后开始着手推行以稳定经济(主要是抑制通胀)和私有化为核心的改革措施。同时,借助奥斯本人与国际经济组织(主要是IMF)的特殊关系,迅速得到了一些国际贷款来缓解国内的资本短缺问题。作为交换条件,阿根廷政府放开了国内的金融资本市场,允许外资和热钱自由进出阿根廷。外资的大量流入短期内繁荣了国内的资本市场,阿根廷的金融投机活动愈发活跃。推动阿根廷经济进一步对外开放的第二个举措是降低关税和升值比索。然而,降低关税导致阿根廷的本土中小企业无力在价格上对抗外国商品。为了弥补实体经济中的损失,很多企业把部分资金转移到投机活动之中。到了1978年,奥斯的经济改革计划祭出了最后一项政策:固定汇率制度(pegged exchange rate)。官方本意是试图用固定汇率制度来稳定市场预期和降低

^① 原义是政府在面对国内人民的罢工、社会不安、暴力或政治颠覆等行为所做出的回应,是一场由国家所支持的战争,发动者以威胁、恐吓的手段来要求国家安定。这里特指阿根廷于1976年至1983年间发生的政府镇压行动。

国内的通胀压力,然而市场并没有对固定汇率制度做出官方希望看到的反应。这个局面是20世纪70年代国际因素和阿根廷国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导致大量石油美元资本的出现。这些国际资本的一部分涌入阿根廷,希望借助阿根廷的经济调整期出现的特殊政策获得高额收益。事实上,国际资本在这一时期的投机活动不仅获利颇丰,而且风险非常小。一方面,阿根廷官方为了吸引外资而在国内维持了很高的利率;与此同时,因为这些资本大多是进入公共部门,所以阿根廷政府对其进行了担保。其次,阿根廷外债在此期间继续攀升。因为阿根廷政府不断从国际组织借钱和向国际资本融资,而本国的实体经济却并没有在比索升值的情况下出现强势复苏的势头,这导致企业界始终对经济前景持悲观情绪,而在资本市场短暂繁荣的背景下进一步刺激了通胀压力的释放。最后,阿根廷的整个经济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措施实施后变得更加不稳定。诚如前文所言,因为在金融领域的投机行为收益高、风险小,所以阿根廷的经济核心迅速转移到了金融业。因为政府完全开放金融市场,资本可以自由出入阿根廷,导致国际资本可以轻而易举地逃离。通货膨胀的压力一直高企,投机活动愈加疯狂,居民收入占国家GDP比重在低位徘徊,^①贫富差距和贫困问题没有得到丝毫解决,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最终使得严重的经济困难在1980年年初爆发。

到1980年,企业的问题迅速爆发出来,高利率政策再也无法维持。当年3月份,央行最终允许了阿根廷最大的私有银行和其他三家大型银行破产。政府为了防止银行业的崩溃接收了这些银行的全部债务,这导致政府进一步出现财政压力而被迫实施一些经济紧缩计划。阿根廷的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在这一过程中遭受的损失最大。社会不满情绪随着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而蔓延全国。1981年,阿根廷经济决策中枢更换了领导人,但已于事无补。阿根廷比索继续贬值,最高幅度达到400%。货币贬值对阿根廷的经济产生了致命的影响。这是因为很多阿根廷企业是从国际市场用美元融资,所以它们的债务都是用美元结算。当比索对美元贬值400%之时,企业偿还债务的能力也就荡然无存了。为了避免过多的企业破产,阿根廷政府在接收了银行业的债务之后又把私营企业的外债通过国有化的手段吸收进来。

阿根廷的案例很好地证伪了加茨基的理论。由于积极信奉和实践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念,阿根廷是一个标准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在军政府执政期间,阿根廷的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进出口数据都在大量增长(参见表5)。在资本流

^① 阿根廷居民收入占比国家GDP,1974年为45%,1976年为25%,1980年为39%。

动方面,1976年政变发生时资本因为担心政局不稳出现外逃,而在军政府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之后,大量资本开始进入阿根廷。在1979年,流入阿根廷的国际资本更是高达46亿美元。即使在马岛战争发生之前的1981年,还是有15亿美元涌进阿根廷的资本市场。按照加茨基的理论,在如此紧密的贸易和金融联系下,阿根廷是不愿意发动战争的。因为经济损失的成本会高于战争的收益。事实上,在1982年,阿根廷确实因为战争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大量资本外逃进一步重创了国内经济,进出口数据也大幅度下跌。但是为何阿根廷政府还是会不顾这些损失去发动战争呢?

表5 1975—1984年阿根廷贸易和资本流动情况表

(单位:百万美元)

	1975年	1976年	1977年	1978年	1979年	1980年	1981年	1982年	1983年	1984年
出口	2961.3	3916.1	5651.8	6400	7811	8021.4	9143	7626.7	7835	8100
进口	3946.5	3033	4161.5	3850	6700	10540	9430	5336.9	4515	4600
资本流动	191.1	-332.7	1286.5	1101.4	4669.5	2551.7	1489.7	-2323.5	-1403	684.3
误差	-1	-192.2	-97.4	30.8	197.9	-298.4	-208.8	-399.3	-363.8	-86.9

资料来源:“Balance de pagos de la Republica Argentina,” BCRA, *Memorial Anual*; “Estimaciones trimestrales del balance de pagos,” BCRA, 1985。

因为阿根廷经济在1979年之后不断恶化,而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军政府直到下台也没能再有所作为。当国内局势开始威胁到军政府的统治且对内政策已经完全失效的情况下,独裁政权寄希望于将国内注意力转移到对外关系上。在这一过程中,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国际资本流动本身并没有为阿根廷带来很多好处。或者更准确地说,阿根廷的对外金融开放产生了不均衡的利益分配结果。国际资本收益颇丰,并且全身而退。部分国内大企业也在国内金融投机活动中受益。而阿根廷的整个社会却在承受着所有的损失。普通居民的工作收入在下降,贫富差距在拉大,贫困人口增加,很多中小企业倒闭。在这种背景下,阿根廷军政府必须另寻合法性的基础以维系自身的统治。因此,事实上是国际资本推动了阿根廷与英国进行的马岛战争。换句话说,不公正的资本带来的往往不是和平,而是战争。加茨基只关注了资本流动的表面,而没有考察资本流动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只有用案例研究,我们才能深入地探析资本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所发生的影响和作用。

六 结论

得到严格的数据支持的社会科学理论可能成为被广泛接受的政治理论话语,对政策制定产生深远的影响。举例来讲,民主和平统计相关性的发现就为世界霸权使用外力干涉手段在他国推行民主化提供了政治理论和实证方面的注脚。同样,资本主义和平实证研究也具有成为这样的政治话语并影响西方国家的政策制定的潜力。然而,如本文所述,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秩序可能不利于国际和平,不符合崛起的发展中大国的利益,在资本缺乏的国家和人群中欠缺法理性。为了更加审慎地对待商业和平论,本文对其进行了细致剖析。本文认为,以加茨基模型为代表的当代商业和平论并不是一个非常客观可靠的理论。一方面,当代商业和平论已经部分沦为新自由主义的话语工具;另一方面,商业和平论的部分结论并不被实证数据所支持,在很多地区并不成立。

批评一个被广泛传播的国际关系理论是有风险的。这种风险部分取决于用哪种批评方式。如果是总结西方学者的批评,形成一个比较全面的批评框架,这种批评所带来的风险比较小。如果是作者通过考察原作者的模型并用新的数据来检验和修正原模型,这种批评所带来的风险会比较大。一方面,这种学术批评非常难以操作,做好更是难上加难;另一方面,这种学术批评很难发现与原模型差异较大的结论。本文是按照后一种方法对加茨基模型进行了考察,在严格遵守 KKV 的研究方法标准和尊重原作者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之上,通过使用新的数据库和修正原模型的概念测量问题,得出了与原作者截然不同的结论。当前需要有更多的中国学者采用本文的批评方式来不断丰富和发展既有的理论,进行理论创新和参与中西方的学术争论。

(截稿:2015年12月 责任编辑:王鸣鸣)